

明清科举与文学

赵善嘉

内容提要 本文从乡试会试与文学聚会,同年师生与文学纽带,时文制艺与文学风格三个方面来剖析明清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发生在明清之际的各种文学流派的消长升替,社团之间的政治争斗及文风习尚都和科举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

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突破传统,走出新路,是目前学界正在努力探讨的问题。有识之士已注意到,将中国的古典文学放置到中国的大文化中去参照联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①不少学者实际上已经或正在这方面努力探索并有所建树。笔者愿效绵薄,试图从明清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明清文学的一系列问题。本篇所谈的科举与文学,作为系列探讨之一,即是本着这个意图所写。

一、乡试会试与文学聚会

乡试会试是科举制的最重要的内容,隋唐以来,即为文人所瞩目。每逢乡试或会试之年,试地文人荟萃,盛况非常。唐代洋州刺史赵匡曾在《举选议》中说:“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唐代如此,明清则更盛。明人顾起元曾历数当时乡会试耗费之巨,说是凡“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门应取杂支与考试供给,致贺举人、进士、贡士等项之费”均由各坊厢编户轮流承充应纳,以至民不堪重负。”(《客座赘语》卷二)由此可见其应试文人之多。唐代的乡会试,文人们单纯为考试而来,中间夹杂着不少替身,“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赵匡《举选议》),故景况虽盛,与文学关系不大。而至明清则逐渐不同。文人们将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看作是交朋结友,聚会结社的好时光,因而不少文人非为应试也赴试地观光。因而乡试之年的省府(包括南京),会试之年的京师,会集四方文人、八路精英,诗赋往来,觥筹交错,无意间促成了一次次文学聚会。此试举数例:

董文友《陈定生先生墓表》:“明年乡试,诸名士毕集,秦淮公宴,呼大铍所教歌儿奏《燕子笺》。”(《董文友全集》卷三)

袁中道《寄李参知梦白》:“至四月尽,乃抵金陵。爱其风景佳丽。……校士之年,多士云集。”(《珂雪斋近集》卷二)又,《东游日记》:“(己酉五月)乙未,大会文士三十余人于秦淮水阁。己亥,大会词客三十余人于秦淮水阁,校书二人。”(同前,卷一)

^① 如《辽宁大学学报》(社科)1988年第5期,张碧波、高国兴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即注意到这个问题。

“己酉”为万历三十七年，南京有乡试，钟惺有《五月七日吴伯霖要集秦淮水榭是日雨》诗纪其时聚会盛况：“五日棹秦淮，水阁曾未历。颇值风日晴，雨意殊未悉。我友越宿招，明朝宜小集。……四座三方言，音殊旨或一。……”（《隐秀轩诗地集》）又，钟惺《赠唐宜之署颍上县事序》：“予己酉游南都，宜之年二十有余。……予与一时同志要宜之为冶城社。”（《钟伯敬先生遗稿》卷二）

四方文人，方言虽殊而旨趣则一，为诗为词而聚会于此。聚会之余，尚结文社，可见其文事之盛。

中国的文人大多长期生活在分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村经济环境中，标榜的是“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黄灯青卷的生活。地域的广阔与交通的落后更造成了他们的闭塞与保守。如果不是有科举制的乡会试制度，那么很难想象中国的文人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形式的定期聚会与交流，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这种聚会给文学带来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聚会促进了各地域、各流派文学的相互影响。王士禛《林茂之先生挂剑集序》云：“万历己酉、壬子间，楚人钟惺伯敬、谭元春友夏先后游金陵，翁一见悦之。”又，《金陵通传》卷二十四：“万历末，公安钟惺等游金陵，古度悦之，诗格为一变。”^② 林茂之即林古度，上元人，王士禛曾“选其辛亥以前诗为二卷，皆不入楚音者也”。（《金陵通传》卷二十四）己酉、壬子正是乡试之年，文人相聚，诗赋往来，彼此影响，以至林古度“不入楚音”的诗格也为之一变。又，万历己酉袁中道在南京大会文士，钟惺等亦预（见前）。钟、袁相见甚欢，彼此引为同调，并“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所短”^③，公安派与竟陵派，文学见解方面大致相同而小处又异，由此可稍稍探得其相互影响的痕迹。

其次，乡试会试之年，名士毕集，素不相识者可结为挚友，虽相知而又无缘晤面者可遂一见之愿。于是诗词得以传诵，作品亦可藉朋友之助而得以刊刻，此实为文学传播之一大媒介。胡应麟与王世贞定交十余年而一直无机会晤面，万历十年壬午（1528）胡应麟借北上应试之机始与其一晤，遂十余年之愿。^④ 康熙五年丙午（1666），陈维崧应乡试在南京与沈默会晤，沈默赏其词作，即欲以其《乌丝词》付梓。^⑤ 钟惺于万历己酉乡试之年得会画家胡宗仁。胡时以画名，亦善诗，而人不知其诗。钟惺即选辑其《韵诗》百七章，胡宗仁诗赖此得以传。^⑥

再次，这类文学聚会增强了明清文人的外倾性。他们逐步地从孤独走向合群，从闭塞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交流融合。文学家因此而找到同调，文学因此而流派纷呈。明清的文学流派之多为前代所无，这固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这类文学聚会所提供的交流、宣泄的机会肯定

② 钟惺为竟陵人，《金陵通传》记误。

③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花雪赋引》：“友人竟陵钟伯敬意与予合……湘中周伯孔，意又与伯敬及予合。予三人誓相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按，《花雪赋引》所记事据吾友陈广宏兄所考，乃己酉年事，详见其所著《钟惺年谱》，复旦大学古籍所藏。

④ 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传》：“壬午……过吴，谒司寇真山堂。”又，卷五十二《将娄江访王长公，先柬二首》诗末原注：“公与余相闻十载余，数订期奉访，以病不果。今秋北上，实以践此盟云。”壬午之次年癸未为会试之年，“今秋北上”即指赴试。

⑤ 《十五家词·乌丝词序一》：“丙午之秋，余与陈子其年俱落第，后会黄山孙子无言，意欲以吾两人诗余梓以行世者。”

⑥ 钟惺《隐秀轩诗地集》《秋日舟中题胡彭举秋江卷》序：“己酉秋，予将由金陵还楚，胡彭举为予写秋江卷为别。”又，《隐秀轩》文集《韵诗序》：“彭举诸体诗，轻重古今，出没正变，有王孟之致。……人或不知其诗，知之或以其画。……（予）自命为知彭举诗也……而余题其《韵诗》百七章。”按：据《钟惺年谱》所考，钟、胡北年始定交，而选《韵诗》事也在此时。

在其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此外,这类聚会由文学性而逐步地转向政治性,也是文人们外倾性增强的一个极重要的表征。中国的文学家历来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乡会试所提供的这种聚会的方式,无疑是极好的机会。因而文学聚会逐渐地演变为政治集会,文学结社也逐渐地演变为政治结社。试看两例:

崇祯三年(1630),张溥、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黄宗羲等以应试集南京,举金陵大会,万寿祺为作秦淮舟会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

崇祯十二年(1639),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等借乡试之年名士毕集之机举广业社于金陵、日相酣饮,指斥臧否,以至“秦淮公宴,呼大铖所教歌儿奏《燕子笺》。先生(指陈贞慧)追念往事,因与太学生侯方域戟手大骂大铖不止,已复掀髯大笑,笑大铖何痴……已而又大骂。其歌儿归诉之,大铖遂决意杀先生”。^⑦

东林余绪,复社端倪于此可见一斑。虽也间或作诗奏曲,其文学性已无多矣。而后至于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等借会试之机“公车上书”,乃是科举制带来的文人集会的登峰造极之举,其纯政治性质已无须多言。自然,这类聚会的转向政治,有其历史背景。而政治性的渗入使文人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如陈子龙的诗和侯方域的文。

二、同年师生与文学纽带

乡试会试之后形成的同年、师生关系中有一种文学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明清的文人们往往利用同年、师生关系作为文学的纽带来连结同调知音。在这方面,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是同年间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文学活动。尽管这种聚会式的活动带有某种政治色彩或应酬目的,但其间主要内容为诗酒唱和、谈艺论文,文学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明代茶陵诗派李东阳及其同年间的活动即属此类。李东阳,天顺八年进士,同年之中有倪岳、谢铎、张敷华、陈音、焦芳、汪铤、郭瑩、刘大夏、刘道、王澄、史芳等。(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其间九人与李东阳同官翰林。他们先是约定“春会元宵、上巳,夏会端午,秋会中秋、重阳,冬会长至。”且“每会必赋诗成卷。”^⑧他们聚会还有些不成文的规定,如各人轮流当会议主席;“非不得已而不赴会者与诗不成者,俱有罚”;(同注^⑧)“凡于声吟哦作推敲势者,有罚。”^⑨众人也极守约,成化二年元宵之会,“天大雨雪,竟日夕弗止,诸友无违约,悉至”。^⑩

当然,这些定期活动只是在同年而又同处为官的特定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一般同年,官不同处,人各东西,定期活动自不可能,但是不定期的聚会仍有之。有些是偶一为之。如李东阳天顺六年举乡试者同年三十五人于成化十二年会于京师武学,“析邵康节《冬至》诗为韵,各赋一诗,而暗其一为序”^⑪虽事隔十余年,同年之纽带却仍有凝聚力。较多的还是不定期地在一段时期内频繁地聚会。如竟陵派诗人钟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是年三月中第,闰三月即与同年集米

⑦ 董文友:《董文友全集》,卷三,《陈定生先生墓表》。

⑧ 黄佐:《翰林记》,卷二十:“天顺甲申庶吉士同铭者罗球辈为同年燕会。定春会元宵、上巳……”

⑨⑩ 谢铎:《桃溪净稿》文卷一,《元宵燕集诗序》。

⑪ 李东阳:《怀麓堂集·文前稿》,卷六,《京闈同年会诗序》:“天顺壬午予同举顺天乡试者三十有五人……乃成化丙申冬至日,兵科给事中四明章君元益,合举之在京师者,会于武学之署。……因析邵康节《冬至》诗为韵……”

万钟湛园内分韵赋诗。^⑫此后数年中,诸同年频频聚会,诗文往来,大有所谓“不让琅琊、历下诸子”之势。^⑬如此频繁地聚会有其特定的背景,正如钟惺之同年丘兆麟回忆此时情景所云:“曾记神庙之时,余同藉兄弟之结绶于朝者颇盛,而其时又边警不闻、退食多暇,故一时同志如陆景邨、钟伯敬、冯少伯、马时良、仲良兄弟逐日过从,说者谓不让琅琊、历下诸子。而嗣是,时事差异,即人之一官,升沉显晦存歿亦不同。”^⑭由此可见,随着“时事差异”,各人“升沉显晦存歿”之不同,这频频聚会自然是良辰难再。因此,这类性质的聚会只能在一个时期内。

同年关系所形成的文学纽带,不仅仅是连系一次次的文学活动,更重要的是它在形成一些文学团体方面显示出不可低估的凝聚力。比如明代的前七子,七人中就有五人有同年关系:康海、何景明、王廷相为同年(弘治十五年),王九思与边贡为同年(弘治九年)。不仅如此,在前七子周围的一些与之诗文往来的友人,大都又是各与七子中某人有同年关系。如张凤翔、何孟春与李梦阳是同年(弘治六年),王守仁、刚璘与王九思、边贡是同年,殷璠与康海是同年。继前七子而起的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学集团的结成,也有类似情况。嘉靖二十六年,李攀龙、王世贞、李先芳、刘尔牧等结诗社于京师。^⑮其中李攀龙与刘尔牧为同年,王世贞与李先芳为同年。这诗社已开后七子先声,嗣后,所谓五子、七子之中,就有梁有誉、徐中行、宗臣三人为嘉靖二十九年同年进士。不但如此,和前七子一样,后七子周围的诗文往来的人物,大都各与七子中某人有同年关系。如刘景韶、徐文通、袁福征与李攀龙是同年(嘉靖二十三年),魏裳、高岱、余曰德与宗臣、徐中行是同年(嘉靖二十三年),魏裳、高岱、余曰德与宗臣、徐中行是同年(嘉靖二十九年),汪道昆、宋仪望、章美中与王世贞是同年(嘉靖二十六年)。明代复古文学流派的产生,从组织形式看,这种同年加同年所结成的纽带关系肯定在其中起了一定的凝聚作用。

门生座师间的关系往往也会成为文学的纽带。这方面较显著的例子是李东阳与其门生。李东阳数任会试考官,其所拔士中,不少是后来之文名卓著者,如李梦阳、张凤翔、何孟春等。何良俊曾说:“李西涯在弘、正间,主张风雅,一时各士如邵二泉、储柴墟、汪石潭、钱鹤滩、顾东江、陆俨山、何燕泉皆出其门。”^⑯钱谦益也称李东阳四十年不出国门,奖成后学,推挽才俊,风流弘长,衣被海内。学士大突出其门墙者,文章学述,粲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门人也。”(《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东阳条)门生座师间所结成的文学关系,引郝文信评李东阳与其门生之关系的一段话可知一二:“出其门者,号有象法。虽遐陬荒壤,无不窃模其调规字体,以鸣于世,岂不盛哉!”(同上何孟春条)

由于文学集团中的文人大多是通过科举而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明清科举中的同年、师生之间的这种文学纽带关系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色彩和功利目的。诗文往来,应酬唱和,既是文学活动,又是政治交际。中国的封建文学难以脱离政治的羁络,从这同年、师生关系所展示的文学现象中,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有益的启迪。此外,如果要从文学的角度来作价值判断,那么,这种同年师生关系所结成的文学纽带,客观地说,在维系或紧密或松懈的文学联盟中起了

^⑫ 马之骏:《妙远堂诗黄集》,《闰三月同丘毛伯、钟伯敬、韩求仲、沈士范、宋献儒、胡仲修、王曰常、家时良集米仲语湛园和伯敬韵》。按,万历三十八年恰值三月有闰,故知诗为此时作。

^{⑬⑭} 丘兆麟:《玉书庭全集》卷十二,《王枕崖先生诗集序》。

^⑮ 《明史·李攀龙传》:“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倡诗社。”又,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刘尔牧”条:“尔牧……嘉靖甲辰进士,王元美初登第,即与结社。”按,李攀龙始官刑曹与王世贞登第均在嘉靖二十六年。

^⑯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孟春条引。

一定的凝聚作用,这多少有些意义。但它使文人局限在既定的小圈子里,缺少流动,彼此模仿,相互应酬,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作品内容贫乏,缺乏个性。李东阳的门生标榜“象法”,“窃模其词规字体”,李攀龙、王世贞的同人也都唯李、王马头是瞻。清代吴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词之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连章累篇,不外酬应”。(《词曲通论》)文学成了交际的工具,其内容如何可以想知。明清诗文也有这样的流弊,互相崇尚、模仿,流于交际、酬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同年、师生关系正为这种崇尚模仿、交际酬应创造了条件和环境。

三、时文制艺与文学风格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要谈的文学风格主要是指散文风格。明代以降,诗文虽衰,但其作为文坛“正统”的地位,却并无多大的改变。因此,散文风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当时文坛风气的变化。

明清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也即本题的所谓时文制艺,它与文学的关系,口碑历来不佳。黄宗羲曾说:“三百年士人之精神,专注于场屋工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明文案》序上)这说的是文。吴乔说:“唐世功名富贵在诗,故唐世人用心而有变。……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耳。”(《答万季野诗问》)这说的是诗。看来清初确有部分文人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因而康熙时曾一度废置八股文,但不久却仍复用之。八股文统治了明清文坛数百年,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它如何如何毒害文学这样简单的认识上,而是进一步去考察它与明清文风变化的渊源与瓜葛,那么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明清文学史增添新的认识。

明清的时文对于文风的影响,恐怕还得从明代的文社说起。明末的士子们为应付科举考试,揣摸八股文的时尚,纷纷集合起来习举业,这种团体也称作社。谢国桢先生曾谈到这种文社的活动情况:“他们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集合同社的文章,选出来,就是社稿。只要社稿能得一时人的景仰,那么他的社一定可以得到势力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论》)当时的社稿确有能左右文风时尚的。万历、天启年间,江西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等人倡导恢复成化、弘治年间的文风,当时一呼百应,以至艾南英常从南昌被请到江、浙一带去选文。自然,社稿左右文风,还有一个商业手段作为媒介。这就是说,象艾南英这样有名的选家,常为书商看重而借以牟利,因为一般应考士子欲知一时风尚,也非得读读这些操纵选政的名手所选的文章不可。

这种以习举业为目的组成的社盟,也并非所有成员皆能“十日一会”、“月一寻盟”的。有些社盟,成员情况极其复杂,分处天南地北,彼此之间还不一定全认识,不要说是聚会了。如明末冯梦龙等人为研读《春秋》而组成的文社即是。这个文社的成员,既有像钱谦益这样的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士子。^①自然,名家是不多的。因此,这样的成员结构有些像群星拱月的陈式。这种月朗星疏式的松散结构,提示出维系这结构的纽带便是风行南北,牵连东西的时文风尚。除此之外,即使有些什么社规之类的组织原则,也并不怎么重要。由此可见,时文风尚当时已是全国大多数文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他们彼此间极力要在一定程度内保持联系,哪怕是松散的联

^① 冯梦龙结社及其成员情况均详《汕头大学学报》(社科)1988年第一、二期王凌《也考冯梦龙的社籍》一文。

系,以随时得到时文的信息与名家的指点。冯梦龙等人的结社正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

于是一些时文大家操纵了文坛,文风随其所好而时有所变。在明代,即使官方想要按照自己的旨意指导文风,也难以扭转时尚。万历年间,礼部奏请选取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然而“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明史·选举志一》)

那么,时文风尚的变化与文学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呢?先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话:

“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禛比晚唐云。”(《明史·选举志一》)

这段话不仅仅是指出了明代时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风尚,更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时文的风尚实际上也是当时文学(散文)风尚的反映,因而会有人将它比作当日的唐诗。

黄宗羲曾说:“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禎”(《明文案》序上)。这里所说的明代散文的几个时期与时文的几个时期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明代文风的变化与时文风尚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究竟体现在时文影响一般散文呢,还是一般散文影响时文?当然,从总体上说,时文与散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但就具体某个时期或某个作家来说,似乎还是有谁影响谁的问题。试再看一段黄宗羲的论述:“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明文案》序上)即使如归有光这样的明文大家,其文风也不免受到时文的影响。这是时文影响一般散文的一个例子。明代中后期,禅宗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喜谈禅参禅,文风也不免沾染之。而时文有“佛经(道藏)摘而用之”的现象,当是受到当时散文风尚的影响。

明代是这样,清代的情况又如何呢?总的说来,清代时文风尚不如明代那样频繁地变化。这与清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强调一统有关。乾隆元年,方苞“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曰《钦定四书文》,颁为程式。”(《清史稿·选举三》)方苞虽厌恶时文,犹不得不遵命,而一般士子,以时文为谋利禄功名之手段,自然仿此程式亦步亦趋,明代士子那种“不遵上指”的举动,在清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清史稿·选举三》)这“益轨于正”四字,说明了清代时文风尚即使有些变化,也是渐趋于纯正。

清代时文的这种纯正风格使它得以和清代势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和平共处、互相影响。桐城派的方苞时代,尚羞于与时文为伍,以为时文有害古文。

桐城派的这种时文与古文共处的主张,为他们在古文理论上吸取时文精神打开了大门。因此,桐城派的所谓“义法”其实质乃是时文的为圣道立言的宗旨的借鉴,所谓“文法”,强调“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刘大槐《论文偶记》)这无疑是受到时文的那种体制、规范的启发。可以说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立,与清代时文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而清代时文在康熙以后“益轨于正”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受到桐城派古文影响的缘故。

明清两代的文人在时文上面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如果姑且撇开它的流弊不论,那么,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由于它与明清散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应给它一席之地。清代的焦循曾说:“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易余蘧录》)话虽过分了些,还是颇具历史眼光,很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的。